



### 作曲家羊鸣回忆歌剧《江姐》创作历程——“写不好这部歌剧，我们就对不起江姐”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作为歌剧《江姐》的主题歌，《红梅赞》历经60余年依然动人心魄。红梅凌寒盛开，一如29岁时牺牲在胜利前夜的共产党员江姐，柔美却坚韧刚强，有一身傲雪凌霜的铮铮铁骨。

《五洲人民齐欢笑》《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绣红旗》等无不深入人心，但最令人回味的，莫过于主题歌《红梅赞》。一般来说，歌剧创作要先有主题，后有咏叹调，但《江姐》的主题迟迟定不下来。

始终关注《江姐》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曾留学国外，对歌剧创作很有见地，他说：“没有主题歌，就提不起神。”主题歌一定要成为《江姐》的点睛之笔。阎肃试着写了一段“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吹雨打也平常，心中自有红太阳，我们握紧舵，划好桨，向着目标奔向前方”的歌词，大家看了，都不太满意，因为它“只有概念，缺乏形象和艺术语言”。“没有好的歌词，我们怎么作曲呢？领导压我们，我们就压阎肃。”当时的紧张和压力，如今回忆起来已是笑谈。羊鸣记得，阎肃有时大半夜兴冲冲地拿着剧本来找他，被挑了毛病后，气得“咣”地关上门，抱怨道：“真难伺候！”羊鸣只能劝慰战友：“不是我们难伺候，是咱们要对观众负责。”

被逼到“走投无路”时，阎肃从兜里掏出两个月前写的一段关于梅花的歌词，朗读起来：“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傲雪凌霜的红梅意象，一下子抓住了羊鸣，从精神到形象，梅花都能和江姐联系起来，正像她的化身。音乐的灵感来了！“那真是从血液里喷出来的东西。”羊鸣感慨。《红梅赞》虽然时长只有几分钟，但创作时8次易稿，修改20余遍，“每个音符都不放过”。以“红岩上红梅开”一句为例，羊鸣至今依然能唱出它的演变过程。最初，这一句的旋律取自江姐初登场时的“看长江”，但听起来有些简单，不够抓人，要再美点，于是“红梅”提高了小二度。听来听去，还是不够，那就再给它“甩”一次。反复推敲后，一个个音符如待放的花苞般层层展开，直至凌寒绽放，荡气回肠——江姐作为革命者的刚毅与作为女性的柔情，在音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 60余年《江姐》传唱不息

呕心沥血的《红梅赞》写完了，但它真的能如愿在群众中传唱开来吗？谁也不敢保证。一天，在文工团位于灯市口同福来道的大院一角，传来了《红梅赞》的哼唱，原来，文工团每天排练，动听的旋律就这么“灌”到了一位炊事员的耳朵里，切菜时，他情不自禁地唱



起了《红梅赞》。“应该可以了！”面对即将到来的公演，大家有了更多信心。

1964年9月，歌剧《江姐》在北京首演，轰动一时。后来，《江姐》到南京、上海等地巡演，所到之处，场场爆满。刘亚楼将军让羊鸣等人趁热打铁，又创作了一部藏族题材的歌剧《风云前哨》。等羊鸣从藏地归来再到上海时，电台循环播放《红梅赞》，小孩子们跳皮筋也唱着《红梅赞》，人们的手帕上是《红梅赞》的歌词，连商店里卖的暖水瓶都印着一枝梅……

多年来，传唱不息的《江姐》感动了很多，也鼓舞了很多人，“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便是其中之一。“《江姐》是我一生的榜样，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是我心中的经典，我最爱唱的就是《红梅赞》。”张桂梅这样说过。空政第二代和第五代“江姐”的饰演者孙少兰、王莉曾从北京赶到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与张桂梅相见，并赠以精心收藏的歌剧《江姐》总谱。轻轻翻阅着曲谱和歌词，张桂梅的眼睛亮了，她指着一个个段落兴奋地说：“看这里，这是《看长江》。”随后，她的歌声回响在校园里：“看长江，战歌掀起千层浪。望山城，红灯闪闪雾茫茫……”张桂梅回忆起当年在宣传队里唱《江姐》的经历，细算起来，她的“资历”比孙少兰还要深厚。

歌剧《江姐》为什么如此成功？多年来，有关的评论数不胜数，因为它融汇了民族音乐的精华，亲近人民大众；因为它的人物塑造立体，哪怕叛徒甫志高也并非脸谱化的角色……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羊鸣始终不忘，那是当年的创作者共同许下的重逾千金的承诺：“写不好这部歌剧，我们就对不起江姐。”

高倩

#### 从民族音乐中提炼神韵

20世纪60年代，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出版，无数读者被江姐的事迹深深触动，其中也包括当时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几个热血的年轻人。那段时间，文工团创作组写了一部小歌剧《刘四姐》，反响很好，大家兴致高涨，想再接再厉。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红岩》中的江姐，只用18天，剧作家阎肃便完成了歌剧《江姐》的剧本初稿，相较之下，音乐部分的创作要坎坷得多。

起初，羊鸣与作曲家姜春阳历时一年交出了一稿，却被领导彻底否定，“一个音符也不要留”。不留情面的批评当头砸来，羊鸣和姜春阳都流汗了。后来，为了更加贴近江姐的人物原型，四川籍作曲家金沙也加入创作。他们和阎肃一起南下采风，走访江姐生前的战友，并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华蓥山等旧址。在关押过先烈的牢房里，羊鸣见到了老虎凳、竹签等刑具。

再次提笔时，大家决定从川剧中寻找灵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然而，因为“靠”得太过，对四川音乐元素生搬硬套，这版“筋骨有余、柔情不足”的音乐仍然没能得到领导的肯定。作曲家们再度启程，除了四川，又去了江南一带，吸收越剧、京剧、婺剧等当地音乐的元素。民间戏曲的表现手法、板腔等精华融汇成了《江姐》的音乐基调，是与西洋歌剧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神韵。

#### 《红梅赞》修改20余遍

歌剧《江姐》中，经典唱段很多，

### 著名配音艺术家乔榛用声音陪伴几代观众成长为异国经典赋予东方的情感与温度

他的声音，曾穿过《魂断蓝桥》的雨雾，流连于《叶塞尼亚》的吉卜赛风情，也在《廊桥遗梦》的麦迪逊县桥头留下叹息……那些闪耀在银幕荧屏之上的异国灵魂，经由他的声音塑造，被赋予东方的情感与温度，伴随了几代中国观众的成长记忆。他就是藏在上千部（集）译制作品和无数经典人物背后的著名配音艺术家乔榛，一位不惧岁月和疾病，以声为桥、以艺存真、以爱抗癌的“吟风者”。

#### “要和团队一起努力，重振译制片雄风”

位于上海的乔榛语言艺术馆是一座外形设计成老式收音机的四层建筑，静静伫立在黄浦江边、闵浦二桥畔。这里是乔氏祖宅旧址。当年，乔榛祖父乔念椿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创办火力发电站，修建摆渡，开办孤儿院，积极宣传抗日，将桥梁命名为“救国桥”“爱国桥”，用行动诠释“乔家姓乔，当为家国架桥”。这份担当，也化作乔榛骨子里的使命感——他视译制片为“文化之桥”，既通过外国优秀作品拓展文化视野，也让中华语言文化魅力远播世界。

艺术馆一层，有一处设计成“耳蜗”形式的“回音壁”，参观者可以戴上耳机，欣赏墙上一个个多媒体屏幕上由乔榛配音的作品。《叶塞尼亚》中风流倜傥的奥斯瓦尔多，《廊桥遗梦》里浪迹天涯的罗伯特，《哈利·波特》中的邓布利多……

灵魂荡漾干净，要摒弃脑子里的私心杂念、自我意识。作为演员，不能想着展示自己的声音，欣赏自己的演技，而是要用一颗纯净、真诚的心，去面对人、面对作品、面对艺术创作。”

虽然年过八旬，但乔榛仍未停下脚步。2025年上映的经典电影《控方证人》中，他以沉稳庄重的声线为法官配音，让经典译制片魅力再掀热潮。

其实乔榛配过很多小人物、龙套角色，比如《寅次郎的故事》中其貌不扬、性格鲜明、很有喜感的小人物寅次郎，《虎口脱险》里那个斗鸡眼射击手。在乔榛眼中，角色无论大小，戏份无论多少，都必须认真对待。他始终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要和团队一起努力，重振译制片雄风！”

#### “不爱打扮自己，却想打扮大地”

进入艺术馆四层的乔榛书房，书柜上摆放着的各种奖杯、证书，无声诉说着这位老人一生的付出与荣耀。其中，“金鸡奖终身成就奖”奖杯熠熠生辉，格外耀眼。

“我真是受之有愧。我觉得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很多人都比我做得更好。这份荣誉授予我，我想是对译制配音艺术和语言表演艺术的关切、厚望、支持和期待。”

这也是他在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执意请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和他一起上台领奖的原因。在他看来，这荣誉应归功于整个译制事业，而这沉甸甸的奖杯，寄托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厚望与嘱托，也要靠所有同行者共同砥砺前行。领奖时，他从轮椅上努力站起，用一首小诗道出自己的感恩与热爱：“我只是一棵普通的小草，不爱打扮自己，却想打扮大地。”

和乔榛获得的众多奖杯证书并列而置的，还有一座与众不同的铜铸雕塑——那是一张吟诵的“嘴”与一只



紧握话筒的“手”的复合体，源自20世纪90年代两位热心观众为他制作的模型，凝聚着人们对他“好声音发声者”的致敬。后由友人铸铜永存，并让他题名“吟风者”，寓意他以口为器，吟咏时代之风、人生之风、灵魂之风。

#### “妻子是我人生最大的福气”

与乔榛艺术上的“澄怀观道”相映照的，是他生命中另一场旷日持久的坚韧跋涉——与病魔的抗争。四十多岁那年，癌症的阴霾猝不及防袭来，此后，他又经历了六次病魔侵袭；骨转移的痛苦、脑梗脑梗的重创，也接踵而至。但他似经冬愈韧的古木，病痛斫其枝干，却让艺术之根扎得更深。如今的乔榛，气色红润、思维清晰、精神矍铄，虽然行动有些不便，但还能登台，还能工作，还能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激情燃烧。

在抗癌之路上，艺术使命是他的精神铠甲，妻子唐国妹的深情陪伴与悉心照料，则给予他最温暖温暖的港湾。

“她是学音乐的，性格宽容善良，待人热忱真挚，对我更是倾尽所有，无微不至。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福气啊！”拉着爱妻的手，乔榛眼中满溢感激与深情。

王润

###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陶玉玲逝世 “二妹子”的甜美笑脸从未走远

“九九那个艳阳天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每当电影《柳堡的故事》的插曲《九九艳阳天》的动人旋律响起，很多观众的眼前都会浮现出片中梳着大辮子的“二妹子”那张淳朴而甜美的笑脸。

1月15日，“二妹子”的扮演者，电影表演艺术家陶玉玲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 她饰演的“二妹子”打动了无数观众

陶玉玲1934年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1949年从老家镇江来到南京，进入华东军政大学戏剧队学习，校长陈毅在开学典礼上给学生们讲的题目是“为人民服务”，这次讲话指导了陶玉玲的一生。

1953年，陶玉玲在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工作，常常随部队去浙江、福建等地为前线战士们作慰问演出。不久后，华东军区政治部文艺工作组组织演出根据《东山岛保卫战》创作的话剧《东海最前线》，陶玉玲在剧中饰演杨赛英，火遍了大江南北。

1957年，由王苹执导，陶玉玲、廖有梁等主演的电影《柳堡的故事》在全国公映，很快就风靡全国。片中，陶玉玲扮演的二妹子与廖有梁扮演的新一军副团长李进之间的爱情故事打动了无数观众，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银幕上第一次出现军人谈恋爱的电影，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 胡德夫开启“台湾民歌运动”50余年——

### 在“匆匆”里唱出“从容”

1975年，台湾知名民谣歌者胡德夫为诗歌《匆匆》谱曲并演唱。“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时光倏忽而逝，白衣飘飘的青年已是须发苍苍，胡德夫依旧在舞台上歌唱。

去年，“匆匆50年”胡德夫民谣音乐会大陆巡演。“从前我唱《匆匆》不太好意思，很像年轻人在劝同事或者比我大的人，说要珍惜光阴。现在唱起来就很自然从容了，歌词像从心底流淌出来，既是唱给大家，也是唱给自己。”胡德夫说。

#### “唱自己的歌”

上世纪70年代，胡德夫身边流行的是西洋歌曲。胡德夫说，台湾之前没有民歌，是自己与李双泽、杨弦（后被并称为“台湾民歌运动二君子”）3个“臭皮匠”决定把歌“种”下去。

大三那年，为给患癌的父亲筹集医药费，胡德夫从台大外文系休学，日夜打工挣钱，并在台北哥伦比亚咖啡厅驻唱。在那里，胡德夫遇到了李双泽。这位小时随母亲来台的菲律宾侨生，在后来的校园演唱会上中流砥柱可口可上，质问唱“洋歌”的青年：“全世界年轻人都在唱可口可乐，唱洋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



王润

为了更好地贴近二妹子的内心，陶玉玲很早就和王苹导演的要求下，下乡学习各种劳动技巧，比如割稻、插秧、撑船等，最终都熟练掌握了。当年，陶玉玲虽是一名有着多年舞台经验的话剧演员，但是拍电影还是第一次。“这部电影的成功，是导演智慧的结晶”，陶玉玲生前谦逊地说。

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陶玉玲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总理对她说道：“你演的二妹子很好啊，你要继续努力，不要骄傲。”这句话让陶玉玲一生难忘。

对于《柳堡的故事》取得的巨大成功，陶玉玲曾经这样总结：“军爱民，民拥军，是我们党历来的光荣传统。《柳堡的故事》如果只是两个年轻人谈恋爱，绝对不会成为经典。正是有了军民互爱这样的背景，这部电影才有了真正的生命力，军民一条心，军民一家人，这才是影片经久不衰的真正原因。”

#### 曾身患多种癌症 每次都挺了过来

在1964年公映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陶玉玲凭借只有两出戏的“春妮”一角打动了无数观众，细腻传神地演绎出角色的果敢、淳朴，塑造出中国电影史上永恒的军嫂形象。拍摄时，她并没有局限于剧本已有内容，而是通过构想大大丰富了人物的经历，让人物更加立体丰满。

后来，陶玉玲还主演或参演了《二泉映月》《归宿》《如意》《没有航标的河流》《夏明翰》等影片，并先后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百年百位优秀电影演员”、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终身成就奖等荣誉。

陶玉玲还是一名抗癌英雄，曾患过多种癌症，但每次都挺了过来。她曾在日记里写道：“共产党员都不怕，还怕癌症？实践证明，癌症并不可怕，它只不过是一个病的名称，很多人都是被

吓死的。”

她这样总结自己，“我这一生就两句话，一是要做一个好党员，另一个是要做一个好演员。”对于表演，她认为，“对艺术抱有赤诚之心，才能真正打动观众。舞台上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不管如何，只要站到舞台上，我就要竭尽全力做好表演，不辜负观众对我的期望。”

#### 她是可爱的人是人民艺术家

电影《地道战》《英雄虎胆》的主演张勇手曾与陶玉玲合作过《二泉映月》《光荣街十号》等多部影视剧。2000年拍摄电视剧《光荣街十号》是在无锡，他记得那时陶玉玲还自己带着药罐子，现场熬药吃。“她是抗癌英雄，非常了不起。”张勇手心中的陶玉玲开朗、乐观，没有架子，“她是可爱的人，演的也是可爱的角色；她更是一个好党员，是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祖国的人民艺术家。”

曾经跟陶玉玲合作过电影《九兰》的导演朱丹介绍，2022年电影《九兰》在十三陵水库实景拍摄，朱丹邀请陶玉玲出演片中老年的梅月兰。当时正值六月底，天气炎热。彼时的陶玉玲刚刚做完甲状腺手术还不到十天，连伤口的线都没有拆，家属一开始反对她参加，但陶玉玲却坚持要演，她认为自己参加过当年十三陵水库的建设，对于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很熟悉，再加上她跟“九兰”们的年纪也相仿，毅然接下了这个角色。

由于刚做完手术，她的身体还非常虚弱，但角色却要求她要跑着跳着去追孙女到远处的大门外，朱丹一开始还非常担心，没想到她一喊“开始”，陶玉玲坚强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忍痛完成了拍摄全过程。陶玉玲对于演戏的一丝不苟和对后辈的无私支持让朱丹感动至今，“她给我们的剧组树立了榜样，无愧于人民艺术家的风范。”

王金跃

11岁从台东大武山走出，学习10年黑人灵歌、蓝调、美国民谣，一直唱英文歌的胡德夫，此前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胡德夫后来常说，李双泽提倡“唱自己的歌”，开启了自己的溯源之旅。

1972年，胡德夫创作了第一首歌曲《牛背上的小孩》。此后，《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太平洋的风》《最最遥远的路》等歌曲问世，故乡是驱动他不断向前追寻的原点。

1975年，杨弦和胡德夫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发表以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作品谱曲的《乡愁四韵》等歌曲，开启“台湾民歌运动”。

#### “我一直都在歌唱”

1974年，24岁的胡德夫成为首个在台湾开演唱会的歌手。然而作为“台湾民歌运动”代表人物，他迟至2005年才推出首张个人唱片《匆匆》，即有台湾金曲奖6项提名，并获“最佳年度歌曲”及“最佳作词人”。

关心胡德夫的人一度认为他远离了民歌。“其实我一直都在歌唱。”胡德夫的父亲是卑南人，母亲是排湾人，他成长于大武山下的部落。上世纪80年代后，胡德夫全力为台湾少数民族权益奔走，遭当局打压封杀，十余年无歌可唱。但那段经历，却是他真正“歌唱”的开始。

“当我们开始写歌的时候，已经有了关心社会的情怀。”胡德夫推崇美国左派民歌手Woody Guthrie（伍迪·格思里）的名言——“唱歌不仅为了悦耳，也要对别人有益。”胡德夫向往如他一般，“用尽一辈子的生命在大街小巷唱他心中的歌”。

在远离舞台的时期，胡德夫返回台湾少数民族部落，向义父郭英男再度学习少数民族歌曲。

张盼